

# 扩大文化消费，接下来要做什么

□ 刘士林

一项战略都带有明显的“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内有其合理性和不得已的苦衷，但在取得一定经验也包括很多教训之后，我们就必须回过头来补“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的短板，以便超越最初的凭着感觉和经验的“摸着石头过河”，为有了一定规模、同时风险也不断加大的各种实践活动提供科学和理性的指导。对于文化消费试点工作也是如此。在各地热情不断高涨、获得了一些实惠同时也越来越坚定之后，坐下来认真研究一下我国文化消费城市的概念内涵、外延边界、评价标准、发展模式等，对于规范和引领国家文化消费城市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补课宜早不宜迟，越早越主动。

## 做好“两个完善”：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各地促进文化消费升级的方法、方式、渠道、手段还不多，通过各种补贴来刺激和带动的模式比较普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机制的视野比较狭窄，主要局限在文化管理部门和直属行业本身，对文化消费丰富内涵的认识比较狭窄，对文化消费的总体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要打破这种僵化的局面，需要走开放发展之路，把文化消费和城市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市民生活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更多地借鉴消费社会的一些成功发展经验，如麦当劳、好莱坞以及一些时装业，他们的主要做法是把某种商品消费，变成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时尚，变成人的一种自觉的或无意识的行为，而不只是通过宣传手段强加于人。再如在手段探索上，既要更多地运用金融手段提升

大众的消费能力，注重运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简化消费程序，还要花大力气创造文化消费品牌，努力提升文化消费品的内容和内涵等。在这些方面，提高策划、服务、供给的精准度非常重要。

目前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的建设主体，主要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相对比较灵活、反应快捷的“市场的手”还受到较多的束缚，没有被解放出来，这是造成文化管理部门特别“忙”和“累”以及文化企业方面特别“乱”和“烦”的深层次原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这两个“完善”对深化文化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改革的核心是，文化管理部门如何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和动员这个传统角色，逐渐变革和转型为按照市场规律和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去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的新模式，这就需要以文化管理体制的简政放权和深化改革为战略突破点，对主要属于市场和通过市场手段可以解决的，要更多地放出去和放下去，尽量减少财政的刺激和政府的杠杆作用，更多地依靠社会团体、文化企业等市场主体，同时积极培育和避免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自主和自治能力，避免一直以来的不去的“成本很高、人民群众获得感有限”的魔咒，为从根本上扭转文化消费只有一堆统计数据而真实内容比较苍白，以及政府方面的投入一旦终止或刺激减弱、一切又回到原来的老样子的文化消费困境。

## 把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两者的共生和良性发展机制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是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不仅是财富的集聚，城市的本质是可以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同时，城市也是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的主战场。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把人文城市列为新型城市的五大内涵之一。文化消费政策、机制和战略的研究制定，一定要认真研究城镇发展的规律、趋势和需要，把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两者的共生和良性发展机制。

当前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极端的“逆城市化”思潮。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聚直接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局部出现了人口和资源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向流动，我们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城镇化”。但无论从世界城市化的总体格局和历史进程看，还是就我国目前的“逆城镇化”的体量和程度而言，我国的“逆城镇化”现象只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根本上不可能取代“城镇化”这个当今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的主要原因。城市在任何时代都代表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最高发展水平，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一定要在我国城市化更高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实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 齐鲁策论

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总结推广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经验和有效模式”，“健全消费政策评估机制”。

## 文化消费已成为文化建设领域快速崛起的“第三板块”

2016年4月，文化部和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同年6月和2017年2月，第一批第一次26个和第二次19个试点城市相继公布，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济南、青岛等城市均在列。到今天为止，为期两年的试点培育期已接近尾声。

众所周知，我国文化建设长期以来一直分为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两大板块，但自2016年试点启动以来，以往没有地位、不受关注的文化消费，不仅实现了和文化产业、公共文化的并驾齐驱，成为文化建设领域快速崛起的“第三板块”，而且对促进文化消费升级以及对经济和城市发展发挥了明显的拉动作用。这都说明两年来的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取得了比预想要好得多的效果。文化消费未来的空间有多大？主要可从两方面看：对外是中美贸易争端不断激化、持续化和常态化；对内是十九大提出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在此背景下，依靠文化消费拉动内需、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调整，日益显示出重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要做的事情多、要做事情的人多、国家和政府的发展和建设标准高以及时间紧迫、机遇易逝等原因，我们的每

## “亩均论英雄”本质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是一场从“量”向“质”、从“多”向“精”的华丽转身。

“亩均”本是农业术语，指的是农产品的产量、种植业的效益。浙江省把这个术语引进到工业和整个经济评价中来，作为评价GDP、工业增加值、税收、劳动生产率、污染等的指标，根据企业占地和实际产出，以亩产效益为核心考核企业，而不同类别的企业，在财政奖励、要素价格上也分别享受不同的待遇。同样一亩地，换了打开方式，画风截然不同。

作为一种创新型提法，“亩均论英雄”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笔者认为，正是因其抓住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都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都不断提高的发展，而“亩均论英雄”则是将这一特点进一步放大，通过资源差别化措施、要素科学化配置、政府精细化管理，形成强有力的绩效杠杆，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亩均论英雄”强调总产量，更强调单位产出，其本质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兼具持助力转换，又促进降本减负，在全面落实企业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既坚持正向激励，又加强反向倒逼。以“亩产效益”为核心，以差别化措施为手段，完善激励倒逼机制，优化产业政策，促进优胜劣汰。“亩均论英雄”蕴含的逻辑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较小的资源消耗实现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样的企业理应“好马配好鞍”，给予最优待遇鼓励发展；相反，对那些耗地耗能的落后企业，则应通过反向倒逼，促其腾笼换鸟。可以说，“亩均论英雄”不仅论出了效益，更是论出了成败，“大锅饭”“大呼隆”已无法隐身，谁好谁次一目了然。那些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落后企业，过去可以凭着土地的自然增值就能过好日子，如今则是“压力山大”，得过且过最终难免遭到市场淘汰。

对于山东而言，在全面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亩均论英雄”改革无疑更具意义。只有挤压粗放经营空间，增加亩均产出效益，才能在留得青山在、保住好空气的同时，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因此，笔者认为，实施“亩均论英雄”改革，是山东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

首先，“亩均论英雄”改革是破解要素瓶颈的一剂良方。当前，我省在土地、能源、环境容量等方面均面临瓶颈制约，对于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内实现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亩均论英雄”改革无疑是一剂良方。它以市场为导向，在资源配置中向高产区域、高端产业和优质企业倾斜，为优质资源找到更合适的“主人”，同时倒逼企业以创新为抓手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

# “亩均”概念与高质量发展

□ 史新

场改革将有助于形成有序的资源市场竞争机制，让资源要素得到最高效的配置，加速全省经济发展效益提升。

其次，“亩均论英雄”改革是推进“腾笼换鸟”的指挥棒。经济发展要与时俱进，评价体系也要迭代升级。在各种评价标准中，以“亩均税收”来论高低是当前衡量企业经营水平的各类参数中相对较公平理性的，这不仅是政府推进改革的指挥棒，也是企业普遍认可的评价标准。通过“优胜劣汰”式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盘活存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淘汰落后产能的内在动力将不断加强，山东“腾笼换鸟”的进程将不断加快。

最后，“亩均论英雄”改革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在“亩均论英雄”的改革指挥棒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考虑如何提升“亩均效益”，化“被动”为“主动”，积极投身转型升级，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向技术创新要亩均产出，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不断提升。由一个个市场组成的“亩均英雄”们，就会释放出强劲的新动能，推动山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促进山东产业发展层次不断提升，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带来源源不断的“燃料”。

“亩均论英雄”是一场从“量”向“质”、从“多”向“精”的华丽转身。转身的背后，是对企业转型升级能力的大考，也是对政府执政效能的大考。在这场关乎未来发展的“考试”中，山东必须抓住机遇，迅速行动，将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与“亩均论英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用优异的成绩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切实转变思想。“亩均论英雄”意味着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考核不再是简单地以GDP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论英雄，而是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要求各级各部门都要进一步转变思想，淡化“速度情结”，强化“质量关切”。同时，企业在投资经营时，要算土地账的“买卖账”“补偿账”，更要算工业用地的亩均“产出账”，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改变“摊大饼”式的粗放增长方式，并切实改善生态环境，实现集约发展。

坚持创新导向。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创新驱动是关键。“亩产论英雄”的核心动力在于创新，必须将创新驱动理念全面落实到制度程序和评价体系设计的全过程，通过深化综合评价，引导企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造方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实现“亩产论英雄”与“创新论英雄”有机结合，催生一批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

完善评价机制。把握“亩均论英雄”的关键就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综合评价机制，差别化配置激励机制、大数据支撑的预测决策机制。进一步明确数据统计口径，细化差别化政策实施，加快工业外评价体系建立。对企业而言，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转型升级、腾笼换鸟、绿色发展寻找新路径。以亩产效益为标尺，加强科技、产品、商业模式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省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 如何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 杜宇玮

##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必须具备行业、技术、产品与组织的“先进性”，拥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系统性”，兼具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的“集群性”，和深度融入并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世界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仅对缓解要素成本上升压力、破解产业结构矛盾和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直接的积极效应，而且对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一个产业空间地理的概念，其建设的载体是产业带、产业区或产业集群。具体而言，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至少应满足以下四个标准：行业、技术、产品与组织的“先进性”、拥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系统性”、兼具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的“集群性”、深度融入并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世界性”。

根据以上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标准，从现实来看，我国大多数现有产业集群无论从产业内容的“先进性”、产业链条的“系统性”、产业集群的“集群性”，还是产业水平的“世界性”方面，都远未达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标准。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及时调整和转变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

在培育战略上，要从单纯依赖外需市场的外

向型集群发展战略，转变为基于内需市场的开放型集群发展战略。随着近年来国内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再加上欧美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外向型产业集群遭遇发展瓶颈，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基本思路是摆脱以往单纯依赖外需市场、专注国际代工的外向型集群发展战略，转向立足内需、面向世界的开放型集群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集聚和配置全球智慧和资源，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和本土创新型产业集群。

在培育机制上，要从注重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和集聚，转变为强调“虹吸”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具体来说，就是要立足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和结构优势，通过国内营商环境优化和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吸引全球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在产业集群内“落地生根”，将全球创新人才、技术知识和智力成果为我国所用，促进本土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培育主体上，要从单个区域或城市的“孤军奋战”，转变为区域间和城市间的“协同作战”。传统产业集群在权利和效益上都具有较大的排他性，“孤军奋战”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往往会导致区域或城市之间的产业同构，从而引发激烈的引资“争夺战”，并且在有限市场需求下导致产能过剩。随着产业升级日益细化，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急需打破行政地域空间的限制，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视野进行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

在培育内容上，要从偏向先进制造业的“单一化发展”，转变为注重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化发展”。我国产业集群的建设，除了完善生产制造功能外，还需要聚焦

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等领域，通过“外引内育”打造生产性服务业中心。一方面，鼓励和扶持支持外企业在华设立研发、设计、销售中心等，吸引跨国公司把技术含量高、生产制造环节、研发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转移过来。另一方面，引导制造业企业沿着价值链从概念设计、原型开发到资源管理、订单管理、生产制造，再到物流管理和营销售后，按照产品附加值的新型创造方式进行整合，推动“制造+服务”融合，拓展制造企业盈利的新空间，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

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关键在于创新要素集聚和配置。在大国条件下，发挥内需市场规模和梯度的“虹吸效应”，是集聚全球创新要素的必要条件。因此，当前我国应通过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协同发展、城市群融合发展，以及市场一体化等路径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我国应当通过水陆通道无缝对接，实现水陆联运、海陆互动，打造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跨国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和跨境交通运输体系。此外，还要加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电网、信息通讯、能源供给、环境治理等综合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构建和扩张各区域和城市之间的基建网络，超越地理空间限制，发展枢纽经济。

加强产业链分工协作。首先，要明确各地在区域发展新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要各具特色，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防止产业同构。其次，各地特色产业集群不是孤立的“铺摊子”的产业园，而是相互之间要有明确合理的梯度分工，形成一系列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最后，产业发展要以区域生态环境容纳力为淮

绳，合理布局产业，促进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我国可以发挥自身在制造业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和应用性技术上的优势，提高产业生产率，延伸产业链；然后借助各地的资源和市场优势，降低生产成本，转移过剩产能，“虹吸”创新要素。

促进城市群融合发展。城市群的融合协调发展，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交通连接畅通，还包括要素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产业的合理分工以及公共服务的合作共享。对于大多数中小城市来说，本身并不具备各个中心城市所具有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巨大的辐射效应，因而必须“抱团”发展，合力构建特色城市群，以特色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圈形成交汇点甚至是交汇面，以城市群形态融入区域和城市分工中。除了要积极推动新城建设，还需要加强不同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统筹协调。

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形成，需要现代化、国际化、规范化、高端化的专业分工的支撑。为此，需要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网络，打破行政边界，消除地方市场分割，推动商品和人才、资金、技术、旅游等要素在区域内无障碍流动，促进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体化，使得资源要素可以具有有效配置，形成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具体来说，应当加快各地区专业市场体系的整合与提升，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同时，各地区之间互相协调，共同清理阻碍产品和要素合理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打破区域性市场壁垒，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另外，还要加强区域间市场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合作，以及产业园区的共建共享。

# 让“中国服务”成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 王晓红 柯建飞

## 相比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潜力更大、空间广阔，应着力探索和创新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开放路径、促进体系，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共同构成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竞争新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在整体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是全国和地方进出口增长重要的支撑点，并正在以超过全球GDP和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激增，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贸易规则也在发生重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在继续保持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着力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服务贸易向高质量发展。

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看，我国服务贸易目前仍存在如下一些问题：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然滞后。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比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平衡、服务进出口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场结构不平衡等问题仍较突出。

新兴服务领域出口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新兴服务领域仍是主要进口国。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来看，保险、金融、知识产权、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娱乐和其他商业服务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贸易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服务出口发展还相对滞后，在高新技术、关键服务领域对国外的依赖性较强。

人才短缺问题成为长期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看，服务贸易正处于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升级的时期。中国服务贸易的人才培养尚不能充分满足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教育、专业服务等领域，缺乏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服务贸易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发展的瓶颈。

服务贸易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有待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能力较弱，研发投入不足，企业运营模式以传统模式为主，难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变化。中小服务贸易企业的品牌、技术、信用等核心竞争力还有待提升。同时，多数企业还面临着人力成本持续上涨、汇率波动风险、整体盈利面临较低等问题的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引领，不断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空间，探索和创新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开放路径，促进体系、监管体系，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共同构成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竞争新优势。具体来说，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推动服务贸易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鼓励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掌控能力，力争在某些领域抢占全球制高点。特别是要把握智能制造引领全球制造业变革的新机遇，在软件、芯片等关键领域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标准的创建能力。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积极培育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兴贸易业态，推动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跨境交付模式创新，推动“服务+”整体出口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服务提供商，提高全球价值链增值空间。

继续提高服务业开放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放宽教育、文化创意、医疗、养老、专业咨询、商贸物流、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等领域外资准入和数量限制，加强金融开放的监管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新兴服务贸易发展。推动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鼓励外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注重对宜居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建设。坚持引资与引智、引技相结合，建立多个渠道、多种方式吸引国际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优化服务贸易全球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起步时期，对于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都有强大需求。应积极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支持有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走出去”扩大商机，在信息技术服务、研发设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商贸物流、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新兴服务领域加快拓展市场，不断扩大运输、旅行、建筑等传统服务市场。打造“一带一路”的“中国服务”品牌标识，构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轮驱动的全球服务市场布局。

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统计体系。建立健全服务贸易跨部门协调机制，增强发展合力。不断完善人才、科技、财政、统计、法律等政策体系，促进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衔接、共同促进。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政策互便利化。加强减税降费措施，切实降低企业成本。不断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加强信息共享、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机制化建设，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企业信用体系，完善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服务贸易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着力健全服务贸易重点监测企业制度，加强统计直报系统建设，强化统计分析功能。

继续完善服务贸易试点示范平台建设。进一步优化平台发展布局，提升发展质量和改革创新空间。积极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等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的新经验、新模式。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推动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继续深化北京扩大服务贸易开放综合试点，打造具有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服务贸易高地。

加快构建我国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数字贸易发展也将出现新的贸易壁垒，除关税壁垒之外，还包括数据要素要求、跨境数据流量限制、知识产权侵权、独特标准等。要加强研究，积极应对数字贸易规则的挑战，加快既构建与国际标准相衔接，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数字贸易政策体系、标准体系。